

从《儒林外史》中的文人聚会看 明清江南城市的文化功能

孙 逊 孙 萌

摘 要 明清之际,江南城市出现了完备的四级城市层级体系。《儒林外史》以相当的篇幅,描写了发生在这些不同层级城市中的文人聚会活动,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明清时期江南城市的文化风貌。明清江南城市的文化集聚与辐射功能得以实现的基础,便是其独特的交通、经济、人文与自然风光等条件。

关键词 《儒林外史》 文人聚会 明清江南城市 文化功能

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取得了飞速的发展,这突出体现在出现了完备的城市层级体系,它在同时期全国城市中具有极为典型的意义,从全国中心城市,到区域中心城市,再到一般府县城市,再到新兴城镇和市镇,构成了明清时期完备的四级城市层级体系。《儒林外史》的大部分故事,正是以这个庞大的城市群体为发生背景。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对《儒林外史》一书与明清江南城市关系的思索。本文拟以小说所写江南城市中的文人聚会为切入点,来探究其所体现的城市文化功能及其成因与基础。

一、《儒林外史》中的文人聚会 及其所体现的文化集聚与辐射功能

《儒林外史》中,描写过多次文人的聚会活动,其中突出者有娄家二位公子发起的湖州莺脰湖之会、杭州西湖斗方名士们的所谓诗会、杜慎卿组织的莫愁湖湖亭大会,以及寄托了作者救世理想的南京泰

伯祠祭典。这些聚会的发生地都在江南城市中,这或许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明清时期江南城市的某种文化功能。

城市的文化集聚功能,指的是以城市为中心,各种文化得以在此聚集交流,交汇交融。其中,作为文化活动主体和文化精神载体的文人聚会,正是城市文化集聚功能的集中体现。而文人的聚会必然带来文化的集聚,这在《儒林外史》的几次文人聚会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全国中心城市南京的文人聚会。明清时期,南京是江南最大的全国性中心城市。在《儒林外史》中,南京的文人活动占据了很大的篇幅。从第二十四回开始,至全书终结,共有二十二回写到了发生在南京的故事。其中,有两次大的聚会活动,一次是杜慎卿组织的莫愁湖湖亭大会,另一次则是寄托了作者救世理想的南京泰伯祠祭典。

第三十回的南京莫愁湖之会,是一次类似于现代选美或歌舞比赛的大型文化活动:“安庆季苇萧、

天长杜慎卿，择于五月初三日，莫愁湖湖亭大会。通省梨园子弟各班愿与者，书名画知，届期齐集湖亭，各演杂剧。每位代轿马五星，荷包、诗扇、汗巾三件。如果色艺双绝，另有表礼奖赏。风雨无阻。特此预传。”^①这是莫愁湖会之前杜慎卿发出的一张知单，通知全省戏班愿意参与的旦脚赴会，还邀请了十一位南京的文人名士。最终，南京莫愁湖聚会聚集了“六七十个唱旦的戏子”，“都装扮起来，一个个都在亭子前走过，细看一番，然后登场做戏”。可谓是一次全省戏曲艺术的盛会。可见南京这座城市的文化集聚力。

祭祀泰伯祠则是书中描写得最为详尽的一次文人聚会，这次活动不同于书中其他的文人聚会，或为随性游宴、或为诗文切磋、或为娱乐扬名，而是一次寄托了活动参与者（迟衡山、杜少卿、庄绍光、虞育德等人）和作者自己恢复礼乐、振济末世理想的大事。从筹办到最后祭礼结束贯穿第三十三回至三十七回。第三十七回中对祭礼的描述更是不厌其烦。祭鼓三通后，执事者各司其事，初献、亚献、终献、侑食之礼依次而行，全循古礼。参与人数也是全书聚会之最，执事者连同“侑舞的孩子，共是三十六人——通共七十六人”。参加祭礼的文人共有二十四位，其中有很多来自他乡外埠，他们都是一闻盛典，便踊跃而至。这次祭礼聚集了书中品格较高的文人真儒，大家共同募集资金，严格遵循周礼制定祭礼的程序，推选出品德高尚的“真儒”虞育德博士主祭，是儒家以礼治国精神的一次庄严演习，也是一群在倾颓世风下秉承儒家治国理想的文人的大型聚会。

区域中心城市杭州的文人聚会。《儒林外史》还写到在杭州举行的类似的文人集会活动，书中第十八回写到了一次西湖诗会，由一群附庸风雅的所谓“名士”自发组织，大家在会前都收到请帖，写清楚集会的时间、地点、主题，各人应出分资，集会时，大家用凑齐的份子钱买来酒食，在西湖边于公祠借了地方，饭后大家拈阄分韵，回家各自将诗写好后誊抄在一张纸上，每人分发一张。西湖之会有着明确的文化主题——诗会，众人齐集作诗，互相交流诗作，并形成了集会的书面成果。这些“诗人”和诗作的水平如何暂且不论，但这种聚会形式所体现出的文化集聚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杭州西湖的文化吸引力。

一般府县城市湖州的文人聚会。如果说杭州西湖诗会还算是一次预先筹备安排，具有特定文化主题的集会，那么湖州二娄发起的莺脰湖之会则只能算是一次随性的游宴了。二娄是没落相府公子，满腹牢骚，才识平庸，却热衷于效仿孟尝信陵的养客之举，集合了一群不伦不类的所谓“名士”聚会莺脰湖：“席间八位名士，带掣杨执中的蠢儿子杨老六也在船上，共合九人之数。当下牛布衣吟诗，张铁臂击剑，陈和甫打哄说笑，伴着两公子的雍容尔雅，蘧公孙的俊俏风流，杨执中古貌古心，权勿用怪模怪样：真乃一时胜会。两边船窗四启，小船上奏着细乐，慢慢游到莺脰湖。”这次聚会虽然不像几次有明确的主题，但它标榜的是与会众人自诩的“高士”风度，也算是一种文化的集聚与交流。

以上几次文人聚会，分别发生在不同层级的江南城市中。显而易见，无论从与会人员的素质、数量，还是聚会本身的规模，抑或聚会产生的影响来说，区域中心城市要优于一般府县城市，而全国中心城市又优于区域中心城市。这说明文人聚会活动的兴盛程度与城市的发达程度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也说明了城市对文化的兴盛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尽管这些文人聚会规模有大有小，人员良莠不一，组织或精心或随意，但基本上每次文人聚会都有着一定的文化主题和内涵，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在文化集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人都代表或带来某种特质的文化，这些不同特质的文化在江南城市中相激相荡，相克相生，交汇、交融并变化着，然后又通过各种渠道流布传播开去，由此带来了城市的文化辐射功能。

所谓文化的辐射功能，即是指集聚的文化又传播开来，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形成影响，其影响的时间长短和范围大小视所在城市的性质和活动的规模层次而定。

以前述几次文人聚会为例：南京莫愁湖聚会场面盛大，又是雅俗共赏，因而吸引了全城百姓的围观：“城里那些做衙门的、开行的、开字号店的有钱的人，听见莫愁湖大会，都来雇了湖中打鱼的舡，搭了

^① 吴敬梓：《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本文中《儒林外史》引文均出自此本，不再一一标注。

凉篷,挂了灯,都撑到湖中左右来看。看到高兴的时候,一个个齐声喝彩,直闹到天明才散”。会后还评选出了与会的旦脚们的名次高下,“那些小旦,取在十名前的,他相与的大老官来看了榜,都忻忻得意,也有拉了家去吃酒的,也有买了酒在酒店里吃酒庆贺的。这个吃了酒,那个又来吃,足吃了三四天的贺酒。

泰伯祠祭礼结束后,众人回城路上,“见两边百姓,扶老携幼,挨挤着来看,欢声雷动。马二先生笑问:‘你们这是为甚么事?’众人都道:‘我们生长在南京,也有活了七八十岁的,从不曾看见这样的礼体,听见这样的吹打。老年人都说这位主祭的老爷是一位神圣临凡,所以都争着出来看。’”到第五十五回,还有南京市民追忆当年祭礼的盛况,此时泰伯祠已经破败不堪,因此市井奇人盖宽叹息道:“这样名胜的所在,而今破败至此,就没有一个人来修理。多少有钱的,拿着整千的银子去盖僧房道院,哪一个肯来修理圣贤的祠宇!”这叹息之中,包含了作者对圣贤之道衰落和世风颓败的无限感慨。由于泰伯祠祭祀层次更高,因而其影响更久远。

相比南京城里的文化活动,杭州的西湖诗会的辐射功能似弱不少,但即便如此,也不是“众人把这诗写在一个纸上”,“贴在壁上”就了事。第五十四回中,提到了南京丁言志在看一本书,说是莺脰湖唱和的诗,是“当年胡三公子约了赵雪斋、景兰江、杨执中先生;匡超人、马纯上一班大名士,大会莺脰湖,分韵作诗”。尽管这里因后人讹传,将莺脰湖之会和西湖诗会混淆了,但从所举人名可知是西湖诗会,可见当时的诗作后来竟也流传开,并刊刻成书了。

除了文人聚会所形成的文化辐射,《儒林外史》中还写到了书籍的传播,这也是一种文化的辐射。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要数第十八回杭州书坊主的一段话:“目今我和一个朋友合本,要刻一部考卷卖……不知要多少日子就可以批得出来?我如今扣着日子,好发与山东、河南客人带去卖。”江南刊刻的考卷要卖到山东和河南这两个中原文化大省,其影响的范围不可谓不广。

明清时期的江南城市以其文化辐射的广度,对周边地区的文化起到了一种引领的作用。这种引领作用一方面表现为周边地区的文人往往对中心城市的文人行为进行有意识的效仿,如第四十七回,在

“势利薰心”的五河县,出了一位世代诗书之家的虞秀才,不顾乡人白眼嘲笑,独力重修元武阁,此举便是受到了迟衡山当年重修泰伯祠精神的感召;另一方面,这种文化引领还体现在周边地区的文人对大城市文人的崇拜与认同上,如第二十八回,盱眙县的书坊主诸葛天申就专程来到南京,寻求南京的名家选书,并说过这样一番话:“这选事,小弟自己也略知一二,因到大邦,必要请一位大名下的先生,以附驥尾。”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小地方的书坊主,为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和书籍销量,往往寻求名家合作选书,这说明大城市名家在周边地区明显具有较高的号召力和认同度。

二、明清江南城市文化功能得以形成的基础性条件

“人类文明史上每一次艺术的黄金时代,都有一个城市作为背景与支撑,城市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与艺术活动之间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并且对于艺术的繁荣来说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①。这种城市对于艺术繁荣所起到的基础性作用,具体落实到明清时期的江南城市,便是其独特的交通、经济、人文与自然风光等条件。

首先,江南城市间便利的水路交通为文人的交游与文化的流布提供了先决条件。《儒林外史》中所涉及的江南城市,有乌镇、嘉兴、湖州、萧山、杭州、芜湖、扬州、苏州、安东、南京等十余个,可以说,《儒林外史》作者带领着读者随着一个个书中人物的行踪转移,在第八回至五十五回的小说中,对江南的大小城市进行了一次迂回往复的“巡游”,空间转换的频率之高令人应接不暇,这其实反映了江南水路交通便利、大小城市密集的地域特点。

在这样的“巡游”中,我们发现,江南地区文人们的出行是相当便利的,其四通八达的水路网络使文人们相互交往和游乐显得如此轻松与风雅,因此才有《儒林外史》中那么多有关交游、探访、聚会和唱和的描写,并形成了当时江南文人圈相互联系紧密的特点。以第九回湖州二娄三访杨执中的故事为例:

^① 刘旭光:《文艺繁荣与城市文化之关系》,《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湖州娄府二位公子去湖州新市镇探访“高人”杨执中，他们“叫了一只小船，不带从者，下午下船，走了几十里。此时正值秋末冬初，昼短夜长，河里有些朦朦的月色。这小船乘着月色，摇着橹走。……小船摇橹行了一夜，清晨已到新市镇泊岸。”如此旅程，颇有点王子猷雪夜访戴的意味，这也正好迎合了两位娄公子心理上的自我期许。所以一访不得并没有影响他们结交“世外高人”的兴致，“过了四五日，又叫船家到镇上”，然而他们又吃了闭门羹，所幸“这日虽霜风凄紧，却喜得天气晴朗，四公子在船头上，看见山光水色，徘徊眺望”。二位相府公子，能够降贵纡尊，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拜访一个镇上盐店的管事先生，试想如果不是有江南便利的水路交通和沿途诗意的景色，而是车马劳顿、风尘仆仆地赶路，恐怕他们也难有如此雅兴了。

文化的聚集和辐射需要以人的流动或书籍的传播为载体，江南城市之间便利的水路交通为文人和书籍在各个城市之间的往来流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从而提高了文化的传播速度和效率。

其次，江南繁荣的城市经济为文人们提供了多种谋生之道，使大量没有走上仕途，也没有固定产业的文人得以在此谋生。《儒林外史》之所以名为“外史”，乃是因为其中的文人主体，不是“学而优则仕”的科举成功者，而是一群没能或不愿跻身仕途的不第文人。在这些文人中，更有大批没有祖传基业的贫穷文人，繁荣的江南城市经济为他们提供了较之农村更多的谋生方式。其中最有时代与地域特色的一种“职业”当属“时文选家”。明清江南刻书业十分发达，出现了很多著名的书坊和书商。时文墨卷为当时的畅销书籍，而选评这些墨卷的选家则多为熟悉科举考试规则，却屡试不第的文人。书坊为了编选时文集，便会聘请这些文人住在书坊楼上，供应食宿，并付给酬劳。价格的高低往往和编者的名气大小、以前选出的文集是否畅销有关。《儒林外史》中，马纯上、匡超人就是两个这样的时文选家。马纯上在嘉兴文海楼书坊选一部书，得到的束脩是一百两银子，可算是一份相当可观的收入了。匡超人避祸来到杭州，寄宿在文翰楼，正是身无分文之际，书坊主人找他选文章，这才解了燃眉之急，由此跻身“选家”之列。

《儒林外史》还描写了一个与选文行业密切相关

的群体——中间人。落魄文人季恬逸流落南京，“因缺少盘缠，没处寻寓所住，每日里拿着八个钱买四个吊桶底作两顿吃，晚里在刻字店一个案板上睡觉。……那一日早上，连饼也没的吃，只见外面走进一个人来……那人道：‘请问先生，这里可有选文章的名士么？……不拘哪一位。我小弟有二三百银子，要选一部文章。烦先生替我寻一位来，我同他好合选。’”季恬逸于是帮他牵线搭桥，得以度日。他所赚取的，就是从那“二三百银子”中抽取的中介费。

与选文性质接近的，就是卖文为生。第三十六回，虞育德为帮补已落魄的杜少卿，说道：“前日中山王府里说，他家有个人，托我作一篇碑文，折了个杯缎表礼银八十两在此。我转托了你，你把这银子拿去作看花买酒之资。”像这样的机会，也只有较大的城市才有可能经常出现。

等而下之的，是混迹于市井之中的一些文人，依靠算命扶乩（陈和甫）、拆字（匡超人）、刻章（郭铁笔）、修补乐器（倪老爹）等方式，也都可勉强维持生计。可以说，繁荣富庶的江南城市经济，为当时一大批“南漂”文人提供了各种谋生之道。

再次，江南深厚的历史人文积淀为城市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自晋室南渡和宋王朝南迁以来，历经多朝积累，全国经济中心南移，江南不仅经济繁荣，而且文化发达，具体体现在江南多文化世家，多饱学之士，多读书子弟，他们对江南文化的发展贡献尤多；其中特别是江南世家子弟，对江南城市的文化繁荣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些世家子弟往往是饱学之士，又拥有祖上传下的基业，生活富贵悠闲，一方面可以潜心学问、吟风弄月；另一方面又有财力广交文友，为一些没有能力支付文化活动费用的无业文人提供游玩、创作的机会与平台。这促使很多无业文人闻风而至，向江南城市聚集。

如小说中的娄府二位公子、杜慎卿、杜少卿等就是这样的江南世家子弟。就以莫愁湖会为例：所有人的酒饭，付给各个戏班的“代轿马银各五星，荷包、诗扇、汗巾三件”，还有会后赏赐给第一名小旦的金杯，都所费不菲。杜少卿更是“平居豪举”，将家产散尽，以至于在一次从安庆回南京的途中“只剩了五个钱”，如果不是路上遇到故人，险些回不了家。但即便如此，在回到南京的次日，迟衡山向他募集修建泰伯祠的银两时，他还是欣然认捐三百两。可见这些

江南世家子弟对文化的热心参与和推动。

最后,江南城市的秀丽景色也为文化活动的举办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南京、杭州、苏州、湖州等地,自古以来便是全国闻名的风景胜地,也是著名的山水园林城市。这些城市作为诗意的栖居地,可以充分激发文人的创作灵感。在这样的环境中,文人更容易产生进行聚会和创作的冲动与意愿。小说中写到的数次文人聚会,都是发生在著名的风景名胜地。

莫愁湖会文人雅士齐集,品评梨园高下,个中风物景色,唯江南才有。当天,通省一百三十多个戏班的旦脚,齐聚莫愁湖,“诸名士看这湖亭时,轩窗四起,一转都是湖水围绕,微微有点薰风,吹得波纹如縠”。“到晚上,点起几百盏明角灯来,高高下下,照耀如同白日;歌声缥缈,直入云霄”。真是何等旖旎,何等风雅!当时也只有在南京这样的通都大邑和江南中心城市,才可能有如此号召力,组织起这样的文化盛事。

小说第二十九回,杜慎卿曾感叹南京的“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可见所谓“六朝气”已渗透到这座城市的肌理。重建之后的泰伯祠,自然也离不开南京作为六朝古都的气韵,其恢弘的规模,古朴的形制,直观地展现了六朝古都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

西湖诗会尽管是附庸风雅,但此前匡超人去寻找景兰江,有一段话颇可点出江南风物与文化活动的关系:“问左右店邻,店邻说道:‘景大先生么?这样好天气,他先生正好到六桥探春光,寻花问柳,做西湖上的诗。绝好的题目,他怎肯在店里坐着?’”店邻的回答生动地说明了西湖风光对文人日常生活的吸引力。西湖诗会的位置,一开始选在“西湖十

景”之一的花港,后来去了西面的于公祠内,这些文人们每日可随意来去的地方,都是全国闻名的风景名胜地,其自然条件的优越和对文人意绪的影响自不待言。

小说中写到的很多场景,如:赐书楼大醉高朋,杜少卿夫妇游山,庄征君隐居于玄武湖畔,庄濯江话旧于秦淮河边,王玉辉感伤于虎丘寺外,凡此种种,都是江南城市秀丽景色和文人情怀融为一体的生动体现。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的江南城市,以其便利的水路交通、繁荣的城市经济、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秀丽的风物景色,成为文人理想的栖居地和聚会的首选地,并因此承载了重要的文化功能,成为文化集聚与辐射的中心地。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文化的下移,明清之际,“文人”这个群体的准入门槛已经越来越低。《儒林外史》名为写“儒林”,实际上却包含了大量从严格意义上讲根本不能纳入“儒林”的人,他们是混迹在城市里糊口、寄身于权门中乞食,还要辛苦维持自身文人身份的窘迫而尴尬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的种种劣习——追利、逐名、虚伪、自我吹嘘、热衷交游而少有真朋友,这些被吴敬梓嘲讽的丑行,其实也与城市的发展和繁盛有一定关系。从这一角度看,我们或许可以少一点鄙夷,多一些理解之同情,因为这是文人群体在那个时代大背景下难以避免的悲哀与无奈。

(本文作者:孙 逊 上海高校都市文化 E 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孙 萌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时世平